

《父親與民國》

作者簡介：

陳昌智：1940年7月7日生，祖籍河南南陽。1962年畢業於聯勤財務學校財務科六期。曾服務於聯勤總部財務署、救國團基隆市及台北市團委會、巴拿馬華文《共和報LA REPUBLICA》。

前言：脈絡一貫 生生不息

繼我的第一本著作《日照紅樓》於2017年12月出版之後，另一本記述家人，在台灣生活了70年成長過程，取陶淵明田園詩，擇句《陌塵落地》為書名，約10萬字的散文集，也於2018年1月底完成初稿。

2018年1月9日(陰曆冬月11月23日)，係先父百年誕辰，高齡94歲的家母，正值病中，家人分別在台北、洛杉磯兩地，各做了一次追思彌撒，萬般思緒湧上心頭。有必要將先父的事蹟，付諸於文字，留下一點紀錄，有其脈絡一貫、生生不息的意義，作為家人慎終追遠的參考。也佐證父親與中華民國之間，互動的涓涓歷史，是國民革命軍戰史不可或缺的一部份，是一部中國近代史的回顧，也是一部錦繡河山的巡禮。

先父生於民國6年(1917年)，逝世於民國96年(2007年)享年90歲。民國24年(1935年)畢業於陸軍通信兵團教導大隊，民國30年(1941年)，以中尉通信兵排長軍職，進入黃埔軍校通信兵科17期，畢業後升為上尉連長。

我的父親抗戰時期曾經擔任峨嵋山軍官訓練團將官班《無線電野外通信作戰》課程的中尉教官，813淞滬戰役在蘇州寒山寺，殺死兩名剪斷電話總機電線的漢奸。在武漢架設過一條，由漢口至武昌間的，跨江江底電話電纜。

國共內戰期間，由於他的專業、果敢，扭轉了一次戰役的勝負。正因為他對國家忠貞不二，對同胞忠誠，廣州棄守陽江之役，他處事得宜，使劉安祺司令官，以及後來，高升中、上將的兩名同儕免於被俘，自己卻成了解放軍的俘虜。

父親因有《被俘紀錄》，升遷、受訓、出國，過程備受刁難。但父親豁達包容，不怨天不尤人，淡泊一生。身處一個非常時期，他又能怎樣。他是一位好父親、好丈夫、更是一位優異愛國的軍人。

2018年2月4日於洛杉磯。

第1篇：西安事變時的一位

通信軍官

民國22年(1933年)夏天，中華民國陸軍通信兵團，在全國各大都市，招考高中以上程度青年，為通信兵基礎軍官，修業兩年畢業，派部隊工作，培訓地點在江蘇省鎮江市。

民國24年(1935年)4月，先父從陸軍通信兵團教導大隊修業期滿，成為陸軍通信兵准尉通信員，分派至揚州擔任見習官，實習電話線架設、無線電機操作及收發報、電話總機接線及維修等工作。

民國25年(1936年)7月，通信兵團擴大編制，父親於該年10月，委任為第1團第3營少尉排附，奉令前往陝西潼關，配屬第17路軍總指揮部作業，當時總指揮官是楊虎城。(1)

當年父親赴任之路，由揚州到南京，搭津浦路火車北上徐州，再轉隴海路，順黃河南岸西行，經開封、洛陽，到達潼關。

豈料，隴海鐵路西段因內戰因素，火車至河南陝縣，終止西進。父親只好北渡黃河，到達山西平陸，再往芮城，最後抵達風陵渡，與潼關近在咫尺。兩天路程，卻走了六天。

風陵渡隔著黃河，對面就是潼關。始料未及，來往兩地的鐵橋，也被封鎖。這是自出發後第五天中午的事了，眼看報到的時限就到，父親急如星火，整個下午四處尋找渡船。有一位五十開外的船東家，在父親誠懇的請求下，答應次日清晨渡河，這天晚上父親在一家小旅館就就，徹夜未眠。(2)

翌日晨五時許，船東依時到達，岸邊一層厚霜，氣溫很低，隱約可以看見晨曦，遠處傳來間隙的鷄鳴聲。風吹向潼關，對岸處在一片漆黑之中。

當船隻接近對岸大約300公尺左右，當地駐軍向小船喊話，因係逆風，根本聽不清楚在喊些什麼，小船繼續向前行進。不料槍聲大作，一排排子彈在船身四週如雨點般落下。

父親坐在船頭，卻很沈著，到岸時發現船夫已中彈身亡。駐軍看到是一位國軍的年輕軍官，經說明緣由後，順利登岸。船夫遺體送回故里安葬，軍方支付了一筆，在當時看來，還算很豐厚的安家費。

當時陝西情勢相當混亂，正值國軍各次剿共行動之後。民國23年(1934年)，中共《中央蘇維埃政府》放棄瑞金，開始向西移，經遵義、大渡河、川西瀘定、大雪山等地，於1935年10月，撤守至陝北延安。

1935年11月，中共中央提出《放棄內戰，聯合抗日》主張。當時的西北剿共副總司令張學良，代行總司令蔣中正職務，和陝西綏靖公署主任，兼第17路軍總指揮官的楊虎城，竟公然允許中共軍在綏靖區內，作各項宣傳活動。

以東北軍為主幹的剿共部隊，營區內處處可聞，官士兵們唱流亡三部曲中的《松花江上》個個厭戰思鄉，附合《國共聯手抗日》主張。

民國25年(1936年)12月初，張學良和楊虎城佯稱所部不穩，請蔣委員長前往安撫。12月12日凌晨發動兵變，並軟禁蔣委員長於西安綏靖公署。張楊二人提出八項政治主張，但被蔣委員長嚴辭拒絕，軟禁長達半個月，史稱西安事變。蔣中正的《先安內後攘外》政策，成了《國共攜手共同抗日》，中國共產黨有了喘息的機會。(3)

1930年代的中國，電信事業已臻於先進國家之林，毫不誇口。二線以上都市，都設有電信局，運用亞、歐、美三洲海底電纜，進行電報業務至世界各國。同時也啓用載波電話，除了通往海外，在國內包括軍方在內，同軸電話電纜可以同時開通200路電話。軍事電話總機與各地電信局聯線，設有戰備專線。民間與軍方通話，必須透過軍方總機過濾，以確保軍事機密。通信兵是當時走在時代尖端的科技兵種。

父親奉調潼關，在西安事變前一個月，配屬於第7軍42師防區內的一座電話總機房內工作。軍長馮欽哉將軍，係蔣中正的嫡系，與其直屬長官楊虎城的理念相左，西安事變前後，曾兩度臨總機房巡視，訓勉官兵堅守崗位。

1936年12月22日，蔣夫人宋美齡女士，由南京飛往西安。行前，一通《加級緊急電話》，由電信局專線轉至父親工作的電話總機，值班的正是我的父親。發話人及受話人則是蔣夫人和張學良。父親有緣能夠接駁這通電話，是他一生從事軍事通信工作中，津津樂道，值得記述的一件事。

事變結束前的幾天，父親在總機和收發報機旁，連續70多個小時，沒有離機。臉色蒼白、血壓降低、兩眼紅腫、充滿血絲。事後療養了十餘天，才逐漸恢復。民國30年(1941年)父親在重慶，獲頒一枚《參與西安事變有功人員紀念章》。(4，本篇完)

第2篇：先父與淞滬會戰

1937年8月13日，抗日戰爭史上最慘烈的淞滬會戰爆發，揭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序幕。淞滬會戰為期三個月，先父全程參與，經過兩次換防，一次由寶山馳往南翔，另一次由南翔轉進蘇州。

當年父親是陸軍通信兵第一團補充營的少尉排長，配屬88師，負責電話總機通話業務。兩

次移防均在晚間進行，由於國軍車輛短缺，一般後勤作業只能雇用民間車輛支援。

軍方規定，夜間行駛的車輛嚴禁開燈及鳴按喇叭。因此司機的駕駛技術受到考驗，在公路上只能緩慢行進。

兩次換防所見略同，夜空一片漆黑，找不到一顆星星，車輛載著人員及沉重的通信器材，像一頭氣喘吁吁的老牛，緩步在公路上。(1)

駛經之處不時聽到咕咚咕咚聲，車輪底下更傳來哀嚎之聲。這咕咚咕咚聲是汽車輾過屍體時所發出的聲音，哀嚎聲則是來自敵我雙方的傷兵。

戰爭恐怖悚慄的氣氛，使人精神緊繃。在這樣一個場景之下，根本不允許你下車，去辨別車輪下的人誰死誰活，更別說用什麼方法，救他們一命，戰爭的慘烈可見一斑。

先父於戰役中期，9月20日凌晨，進駐南翔雲翔寺。到達後數小時內，立即執行總機通話業務，至10月28日轉進蘇州寒山寺，為期39天。期間日軍砲火波及電話線路中斷，多達20餘次。父親帶領排內弟兄，不畏槍林彈雨進行搶修，生死早已置之度外。在一人陣亡，六人輕重傷的情況下，換得線路□通。通信兵在戰場上前仆後繼的忠烈精神，媲美一線戰鬥部隊，令人感佩。(2)

10月3日，日軍阻斷國軍右翼後路，於廟行、真如、南翔發動全面攻擊，激戰五晝夜，所見之處橫屍遍野。日軍竟在水源、水井下毒，斷我軍民生機。雲翔寺孤懸受困，糧秣供應中斷，官兵已無米下炊，且飲水用盡。寺內兩匹戰馬的尿液，視為珍品，並與寺內僧侶分食南瓜充饑，之後數日竟無任何東西可食。

10月31日，國軍完全退出上海後，戰役中期結束，戰略上已牽制了日軍西進。隨之日軍恣意燒殺，以為報復，雲翔寺未能倖免，亦遭燒毀，僅存佛塔，父親則於三日前奉令撤離，移防蘇州。

蘇州城外楓橋邊的寒山寺，是父親在淞滬會戰中的第三個駐地，寺內一禪房被闢為通信指揮中心的電話總機房。大約是十一月中旬，一個週日的早上，蔣委員長打電話給湯恩伯。父親當時正在總機值班，通話不到一分鐘，突然電訊中斷。照說維護工作一向很好，不應出現這種情形，確實有點不正常。(3)

父親毫不遲疑地奔出室外，見一人在電線桿上持續剪斷電話線，下面還有一名助手接應。父親頃刻間掏出手槍，朝向兩人射去，沒想到槍法出奇準確，兩人當場斃命。

父親立即奔回室內，拿著接線工具，爬上電線桿，搶接電線。算算前後不到七分鐘，電話接通了。這真是要命的七分鐘，有加電影情節。如果當時不立刻處置，誤了軍機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父親立即向湯恩伯將軍報告事情經過，湯將軍只說了一聲《知道了》命令立刻接通委員長電話。另一端蔣先生也問起為什麼斷了話，湯恩伯說明後，委員長說了兩聲：《很好，很好。》。

父親事後被告之，那兩個剪電線的人，是上海來的漢奸，站崗的衛兵也被刺成重傷。一週後，通信兵團給父親記了一個大功，稍後被派至漢口，接受新的任務。

先父陳其二，黃埔軍校通信兵科17期畢業，歷任排、連、營長及軍通信組組長、參謀、教官等職。2007年10月逝世於台北市，享年90歲。(4，本篇完)

第3篇：峨嵋山軍官訓練團的

中尉教官

民國23年(1934年)11月10日，國軍江西剿共，攻克瑞金，共軍大舉西進。次年(1935年)元月，蔣委員長趁勢飛抵重慶，整頓川政，指揮剿共軍事。7月，以軍事委員會名義，繼1933年7月3日成立廬山軍官訓練團後，為促進《川軍中央化》，在成都西南，樂山大佛以西的峨

峨嵋山，成立峨嵋山軍官訓練團，蔣中正兼團長，劉湘為副團長，陳誠為教育長。

民國25年(1936年)12月西安事變，改變了《先安內後攘外》的形勢，川軍中央化更有其必要。國民政府積極開展峨嵋山軍官訓練團課程。甄選四川、西康、青海各省軍政人員，共4003人，前後共三期，接受訓練，全力投入抗日作戰。(1)

民國26年(1937年)11月，淞滬會戰結束後，先父陳其二，由蘇州奉調漢口，晉升為中尉排長。配屬於軍令部本部工作，到任未到一個月，接獲時任軍事委員會軍官訓練團教育委員會委員，同時又是陸軍通信兵團總監的華振麟將軍的指令，由黃埔軍校通信兵科六期的學長王中校為領隊，會同八期的劉少校及先父三人，於一週內抵達峨嵋山報到。教授將官班《有、無線電野外通信》課程。

三人搭乘火車及汽車，兼程直奔峨嵋山軍官訓練團，旅途中勤作功課，父親反覆熟悉助講內容。至於華振麟將軍為何圈選父親，當時的反應是驚喜、惶恐又感戴莫名。(2)

在教官團□，通信教官年紀最輕，軍階也低，父親的階級更是最低的一位。受訓學員及軍職教官，一律住宿營區。各軍長任大隊長，師長任中隊長，旅長任區部長。週六下午及週日，才能外出，星期天晚間回營點名。

父親擔任解說通信器材操作課程，包括電話總機、收發報機、手搖電話、無線電話，收發電報、旗語等等，課程不涉及戰術理論。

學員群星雲集，有楊森、劉文輝、夏之時、尹昌衡、鄧錫侯等人，以及旅長以上軍官。

抗戰時期的川軍，無役不從，四川子弟遍及抗日主要戰場，指揮官多數結業自峨嵋山軍官訓練團，贏得《無川不成軍，有川克日軍。》的讚譽。

父親晚年給我們兄弟姐妹講了一個故事：民國24年(1935年)，時任陸軍通信兵團團長的華振麟，到達培訓通信基礎軍官的教導大隊，慰勉師生，學生列隊接受點名，大隊長尹世鏞是華振麟保定軍校的老同學，陪伴在側。

華振麟對父親的名字，頗感興趣。問道：誰給你取的名字啊。答：我的爺爺。問：有其一、其三嗎。答：其一、其四是堂兄弟，其三、其五是弟弟。

華團長看到名冊上，父親生於民國六年，是隊上最年輕的一位。問尹世鏞：這位同學表現如何。答：名列前茅。

後來，父親在西安事變及淞滬會戰中，表現優異。華振麟對父親，有了更加一層的認識。

當年，尹世鏞絕對不會想到，數年後，站在面前的這位學生，成了他的姪女婿。(3，本篇完)

第4篇：抗戰初期武漢的一條

過江電纜

民國27年(1938年)2月，先父自峨嵋山軍官訓練團，完成教學任務後，返回漢口正金銀行，軍令部本部通信中心。

民國27年國民政府已遷都重慶，武漢三鎮成了對日抗戰的第一線，軍方的通信業務倍增。當時的通信兵團總監華振麟將軍，為因應作戰需求，急需鋪設一條由漢口至武昌的電話線路，以疏解軍方利用民間電信局通話，數量快速增加的壓力。迫於形勢，這條線路要限期完成。(1)

民國27年4月間，由於先父在西安事變、八一三淞滬會戰，以及峨嵋山軍官訓練團期間，有優異的表現。華將軍挑選了我的父親，去執行這項艱鉅的任務。

接到命令的第二天，華將軍在通信兵第一團團部，召開工作會議，指示各項工程相關事項。包括民工、民船的徵召，水紋水流、潮汐漲落資料的蒐集，施工期間航運□通的配合，電

線電纜受壓能力的評估，經費的申請等等。

在各方人力物力充分的支援下，準備工作一週之內就達標完成。接下來，就是施工人員的工作了。

隨後父親跟召來的船夫，會同港務局的一位技正，勘查施工地點，認為從漢口的王家巷碼頭，到對岸武昌的曾家巷最為合適。經請示上級同意後，立即在第三天開始動工。(2)

漢口王家巷附近就是漢江的出口處，到武昌曾家巷大約有兩公里。長江自漢口以下，每逢夏季可通行萬噸級輪船，當時是四月中旬，尚未到航運尖峰時期，減少了一些架線的困擾。

為趕進度，漢口及武昌兩邊同時施工，每隔50公尺安置一艘漁船，下深水錨固定船位，不使船隻晃動。用粗竹桿加長各船桅桿，至5公尺左右，電纜在空中，由甲船桅桿串聯至乙船桅桿，小型船隻可在電纜之下，兩船之間，通行無阻。

施工最難處，是架設一條水下電纜，約有100公尺長，橫過江中最深處，在原有水道上，大型船艦照常通行。

父親雖有架設陸上電話線的豐富經驗，但是鋪設水底電纜，就要考驗他的智慧了。

在港務單位的配合下，父親連同一名排附四名士官，加上六名潛水夫，六人在水面，六人在水底。先探勘水底地形地物，大致與地面相同，增加了父親工作的信心。於是將電纜拉下江底，由潛水夫固定在岩石上。父親背著氧氣筒，水上、水底作聯絡工作。

水底固樁的工作出奇的難，水流又急又冷，水底耽擱時間不能太久，六名潛水夫輪番下水，才能接續工作。(3)

一次失敗，再來一次，從失敗中得到經驗，更利用水流減緩時，加速工作。就這麼一段距離，足足施工了兩個白天，天氣溫暖，晴空萬里也是原因。最後港務局在各水道，設置限高警語，通告各船務公司，船隻通行注意事項。並派遣水警船，全天候警戒。

這條抗戰史上，橫跨長江漢口至武昌間的過江電話線，全程使用同軸電纜，同一時段可承載120條電話通話，足夠戰區內作戰時的載荷能量。基於戰略考量，軍方自行施工，達到快速、經濟、實用、利於拆除的目的。全部工程在全體同仁，精誠團結、堅決意志、奮鬥到底的精神下趕在限期內完成。(4)

經過總機連線、通話品質測試。軍令部、通信兵團相關人員會同軍事監察官，完美驗收。

次日，華振麟將軍陪同多位長官，蒞臨總機房。軍令部長徐永昌將軍，利用新電話線打電話給武昌某部指揮官，話質清晰，相當滿意。華振麟當面嘉獎父親，在場宣告，他是要考驗他的學生，能否擔當重任。

這條線路，在抗戰初期，充分發揮了它的功能，1938年10月，武漢失守，八年對日抗戰第一期結束，這條電話電纜奉令拆除。

先父陳其二，字仲影，河南南陽人，黃埔軍校通信兵科17期，歷任排、連、營長，軍通信組長，參謀，教官等職。2007年10月逝世於台北市，享年90歲。(5)

民國62年(1973年)華振麟八十壽辰，在台學生30餘人，在台北空軍新生社，為老師祝壽，當年鋪設江底電纜的往事，也成了話題。

民國87年(1998年)父親與家母回上海探親，並前往武漢探望其胞弟陳其五，同登黃鶴樓眺望長江，六十年前的事情，一幕幕浮現眼前，前方漢口的王家巷碼頭，隱約可見。父親見景生情，返台後向我們兄弟姐妹道出了，當時他的感受，不禁感慨歎息：《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是非成敗轉頭空，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》。(6，本篇完)

第5篇：長沙焚城時的父親

民國26年(1937年)7月7日至民國27年(1938年)10月27日武漢會戰結束，在抗日戰爭史上

，屬第一期。此其間國民政府於1937年11月27日，由南京遷都重慶，是謂陪都。

1938年10月31日武漢全面撤守，父親於前一日隨通信兵第一團轉進湖南衡陽，派職於南嶽衡山軍事委員會9戰區，戰指中心通信指揮所工作。

蔣委員長於武漢撤守前數日，由武漢飛抵衡陽，住進南嶽官邸。10月25日，蔣由南嶽飛抵長沙，召開高層軍事會議。陳誠、何應欽、白崇禧、張治中、馮玉祥、張群、唐生智等人參加。指示陳誠，武漢失守，考慮焦土政策，焚城撤離。

蔣問張治中：敵人來了，你們長沙怎麼辦。張未作回答，蔣接著說：用火給燒掉，任何搬不走的物資全燒掉，絕對不能留給敵人。

10月31日，蔣委員長在南嶽發表《武漢撤離告全國軍民書》。湖南省主席張治中，訓令長沙城內，無論軍事機關、學校、商店、住宅、工廠，備妥包括汽油筒在內的各種易燃物品和引火材料，情況緊急時，以焦土焚城，對抗日軍。

當時第9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率領52軍、73軍、77師、195師等精銳部隊，正在鄂南、湘北地區，與日軍作殊死戰鬥。南嶽衡山戰情中心，顯得格外忙碌。父親正逢其時，時任通信兵第一團四營中尉排長，就派遣在衡山戰情中心，電報電話總機房工作。(1)

11月12日近午夜，長沙城內有一軍醫院失火，又有一說是一間民間工廠失火，火勢兇猛，濃煙滾滾，照亮夜空。於是以訛傳訛，說日軍兵臨長沙城外三里。省主席張治中、警備司令鄧悌、警察局長文重孚、警備二團團長徐琨等人，急如星火，亂了方寸。未經研判，竟執行焦土政策。

13日凌晨二時，長沙城內數百處同時放火，全市一片火海，混亂可想而知，民眾驚慌失措，未能即時疏散。造成史蹟文物財產鉅大損失，以及數萬民眾的傷亡。

長沙焚城與黃河花園口決堤，重慶防空洞事件，合稱抗戰史上三大慘案。在二次世界大戰史上，長沙與華沙、史達林格勒、廣島、長崎，並列五大毀壞都市。(2)

13日近中午，消息傳至官邸，蔣介石極為震驚，怒火沖天，電話至戰情中心，令值星官速傳鄧悌，因外出公幹，未果。再傳張治中，亦然。父親全程接駁電話，神經緊繃至極。不到三個小時，蔣委員長已到長沙。

十二日當天，放火之前，戰情中心已掌握情報，十一日日軍攻陷岳陽，十二日中日兩軍對峙於新牆河之線，距離長沙約300公里，並電告相關單位知照，為何外傳僅3公里，又不查究竟，的確失職，不可原諒。誤燒長沙城，犯下嚴重缺失，而且貽笑國際。

委員長責令軍法審判：警備司令鄧悌有期徒刑10年，警察局長文重孚有期徒刑7年。警備二團團長徐琨，放火未經批准，有期徒刑7年。但奉批《所判各員，瀆職殃民，一律槍決。張治中撤職查辦。》。(3)

1938年11月16日，長沙焚城第四天，蔣介石選派薛岳將軍，前往長沙任事，以填空群龍無首的場面。

歷史學家袁定華在其著作《抗日領袖蔣介石》一書中，11章4節有這麼一段文字，記述不堪回首的長沙大火：中國軍隊撤出武漢後，統帥部原本預定設在湖南長沙，不料就在其時發生了長沙大火，於是蔣委員長飛駐衡山，轉往重慶。

針對這段文字，引發了蔣委員長在長沙焚城前後，人究竟在哪裡的熱議。在長沙？在衡山？或是重慶。

父親有緣，長沙大火期間，他正在衡山戰情中心總機房，擔任值星官。在接駁蔣委員長的加急電話中，可以見證蔣公當時人在衡山。事件處理完畢後，與蔣夫人宋美齡，一起飛往重慶。(4)

2004年春節過後不久，我和妻前往洛杉磯郡蒙特利公園市，晉見一位尊長，黃埔軍校步科十期的徐遠威將軍。在其寓所與其家人，渡過了一個溫馨愉快的下午。大家聆聽了徐老伯的軍旅生涯，也談到了長沙焚城的軼事。涉獵到，是誰下的命令放火燒城，又是誰放的那第一把火。

這位退役中將，是中華民國前駐巴西代表，相當於大使職位的徐光普先生的尊翁，那年徐老伯已經九十一歲。身體硬朗，還能獨自搭乘飛機，來往於洛杉磯、台北之間。

下達燒城命令的人，可能是鄧悌，更有可能是張治中。文重孚和徐琨是執行單位的首長，自然不是命令者。至於誰放了那第一把火，徐老伯提起了他的一位同期同學蘇遠鵬，此君與蔣緯國、王多年、陳衣凡，同屬黃埔步科十期同窗。當年是長沙警備二團的一位上尉連長，得到命令後帶領連上弟兄百餘人，兵分十餘路，到長沙城七百多條街道，縱火焚城，造成抗戰史上永遠的傷痛。

徐老伯是一位將軍書法家，尤精於仿唐僧人懷素的狂草。我當天求得墨寶一幅，當場揮毫，蒼勁有力，字如其人。寫下《世事若流水 古懷是春風》，以誌追念。(5，本篇完)

第6篇：見證全民大遷徙

民國26年(1937年)7月17日，蔣介石委員長發表《最後關頭》演說，是謂《廬山抗戰宣言》，揭示《國人再沒有妥協的機會，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，便是中華民族千古罪人。》。

同年8月13日，國軍主動在上海發起《淞滬會戰》，牽制了百萬日軍，打破了日本《西進中國，三月亡華》的迷夢。《以空間換取時間》成了抗日戰爭戰略上的最高指導原則。

民國27年(1938年)10月31日，武漢棄守，抗日戰爭第一階段結束。次月，日軍進侵湖南，在此背景之下，中華兒女在《抗戰第一》、《勝利第一》的終極目標下，從全國各省區，利用任何一種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，甚至負重步行，不畏艱險，餐風露宿，將人才、物資、文物，後撤至大後方，廣西、貴州、雲南、四川、西康、青海各地，在中華民族歷史上，是一次抵禦外侮的全民大遷徙。(1)

抗戰時期連四川的老農夫都知道，什麼是《焦土政策》，什麼是《以空間換取時間》。

抗戰的大後方，除西藏地方、蒙古地方不計外，西南6省：桂、黔、滇、蜀、康、青，面積223萬平方公里。西北3省：陝、甘、新面積228萬8千平方公里。大後方9省面積合計452萬8千平方公里，佔當時中國面積1100萬平方公里的百分之四十一，是日本四島總面積37萬8千平方公里的38倍。日本百萬大軍，如果擺在抗戰大後方，每平方公里才0.22人。國民政府的《以空間換取時間》的大戰略，絕對是正確的。(2)

在如此大形勢大環境之下，日軍侵華的戰爭手段有了修正，除了持續不斷在華北、華中、華南各省，與國軍作殊死戰，直到1945年夏初。日軍在華兵力，1940年曾增兵至200萬人。

1938年10月日軍攻陷武漢後，戰略上改採陸空協同作戰，用轟炸方式逐步由東向西挺進。炸鐵路、炸橋梁、炸水庫、炸軍事設施、炸城市中心。1938年初，日本在華軍機，已達1500架。1938年12月，日機選擇湖南境內的湘黔鐵路和湘桂鐵路，進行轟炸。(3)

民國28年(1939年)元月，父親奉令隨通信兵第一團團部，後撤至桂林。服務的第四營第一連內，有三個有線電架設排，一個無線電排，作戰經驗一時之選。

兩座電話總機，十台收發報機，一百餘部電話皮機，三百多盤電話線及架設工具，隨同全連官兵，上了三個火車車廂。開始衡陽至桂林，全長490公里的移防路程。

抗戰時期的湘桂鐵路，起自湖南衡陽，經廣西全縣、桂林，止於柳州，全長650公里，在

抗戰前期，發揮了鉅大的運輸功能。(4)

這列火車上，還各有一個工兵連、衛生連和高砲連。為了避開日本軍機襲擊，多半在夜晚行駛，視地形速度時快時慢，站站皆停，以便增掛車廂。各連連長，每站均聽取站長匯報，瞭解全線通車狀況，作為行車安全參考。

第二晚，車停黎家坪，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。消息傳來，祁陽城已被日機轟炸，數條街道已成火海。冷水灘至東安縣間的鐵路和橋梁，也被炸斷炸毀。

各連長綜合站長意見，冷水灘地勢隱密，遠比黎家坪安全，決議連夜趕往冷水灘。畢竟抗戰時期的軍需物資，極度珍貴，有《一滴汽油一滴血》，《一尺電線救一命》的說法。(5)

冷水灘當年是湘桂鐵路上的一個小站，湘江流經其東南，如今是湖南永州城北的一個區。城南的芝山區，瀟水在此與湘江會合，稱為瀟湘。在軍事戰略上，有極其重要的地位。冷水灘站，今已更名為永州站。

列車到達冷水灘，無線電排已聯繫上桂林的團本部。指令人員隨器材改搭湘江木船，經廣西全縣、興安，至桂林歸隊。(6)

列車調度後退，至一處碼頭最近處，由後勤留守處安排，零陵地區車船動員委員會支援的兩艘木船，已經靠岸。通信器材由車廂到船艙，卸裝一次完成。

正要搬動之時，碼頭得到緊急通知，即將到站的另一列火車，載運一批重要物資，要優先登船，經了解是故宮文物，這是軍事委員會的通令，必須遵行。

這批故宮博物院的國寶，是西遷北、中、南三路運輸的南路，由北平經上海、漢口、長沙、衡陽，運往桂林，再轉重慶。兩百多個大小不同的木箱，是全部故宮文物西遷近20萬件的一部份，由一個步兵連護送，全民支援，一路歷經風霜雪雨，載搭火車、汽車、輪船、江輪、牛車、馬馱、舢舨，甚至拉縴而行。

故宮文物是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文化結晶，國家遭逢空前危難之時，保護文物，全國同胞，責無旁貸。(7)

民國28年(1939年)至民國30年(1941年)，亦即抗戰第一期結束，到1941年12月9日中華民國對日本宣戰期間，湘南境內全民大遷徙的路線有三條：一為湘桂鐵路，二為湘江水路，三為湘桂公路。

湘桂鐵路沿綫被日軍轟炸後，湘江及湘桂公路，立即繁忙起來。然而這兩條運輸綫，水路安全及公路載重均不如鐵路。尤其在湖南冷水灘至廣西全縣(今已更名為全州縣)全長79公里湘江段行駛船隻，也是日軍轟炸目標。(8)

當時中華民國的空軍，已有9個大隊，下屬31個中隊，劃歸中央航空委員會，各型戰機多購自美國，總共也只有300餘架。面對幅員廣大的戰場，主要任務在配合地面部隊作戰，根本無法顧及後勤支援，也只能仰賴高砲部隊擔任後撤人員、物資，運輸途中的防空任務。因此滯留在冷水灘，準備改搭木船的這支高砲連，奉令分三梯次，擔任故宮文物，水上運輸防空警戒任務。(9)

在冷水灘的這個通信連，距離故宮文物運出四個小時之後，才上了船。順江而下過瀟水，轉西南，經湘桂省界的棗木舖，進入廣西境內邊界小鎮黃沙河，已是第四天清晨。

黃沙河在明清時代，是漕運關卡，也是船隻靠岸補給，裝卸貨物的地方。船靠了岸，官兵下船活動，停留三個小時後，續往全縣行駛。

小鎮步行20分鐘足可走完，只有一條大街，數條巷弄。展現眼前的是，悽怖驚心的場景，觸目皆是離鄉背井、流離顛沛、困苦勞頓的難民。(10)

這批難民為數至少有七、八百名之多，多半來自華南各省，少、中、壯年居多。鎮上僅有的兩家客棧，天天客滿，客房裏外皆見席地而坐，臥地就暈的旅客，幾乎騰不出一條通道。

臘月□的湘桂邊界，氣溫仍低，屋簷下，街道旁，裹著棉被將就一夜的人，處處皆是。大樹下栓著與主人同行的騾馬，瘦得可見筋骨。三間小飯館，食物供不應求，顧客沒有選擇餘地，饑不擇食，能夠吃口熟食，已是天大享受。

有個令人心碎的事：大樹下有兩個籬筐，紙板上寫著《請善心人士領養我的孩子》，背面有孩子的家庭背景和原鄉地址。

孩子的父母來自江西吉安，兩個月前從家鄉出發，搭乘了各種不同的交通工具，越往西走越難行，最後無車船可搭，唯有步行一途。家當和孩子放在兩個竹筐裡，夫妻輪流挑擔而行。在湘南丘陵的一條公路上，遇見一批難友，路上卻遭遇到日本軍機的低空掃射，母親慘死槍下。父親帶著孩子來到這個小鎮，病死之前託付難友，領養孩子。在這兵荒馬亂的時期，還有誰會去領養孩子呢。兩姐弟在籬筐□，拼命地哭喊著，大家無能為力。

誠畏天命而悲人窮，老天爺開了眼，一位比利時籍的神父、三名修女，帶領30餘名孤兒，大的有十五、六歲，小的只有兩、三歲，一步一步，步履維艱地走進小鎮，這兩名籬筐裡的小姐弟，第二天由孤兒院□的大哥哥大姊姊們背著，走向大後方桂林。(11)

木船當天傍晚，停靠湘江與灌陽河交匯處的全縣碼頭，午夜開船，官兵可上岸自由活動。

父親與同儕夜遊城景，多數商家已打烊休息，倒是路邊灘的生意很旺，陣陣烤地瓜，煮玉米、花生、毛豆的香味，撲鼻而來。水果灘以銷售柑、橘、沙田柚居多。

在街上巧遇一群談笑風聲的學生，來自長沙、衡陽的五所中學，由各校長帶隊，組成一個近300人的流亡學生團隊，由長沙出發，前往大後方繼續求學，團隊內還有十餘位就讀於國立長沙臨時大學的在校生，分別來自北京大學、清華大學、南開大學。流亡的路線大致與難民雷同，搭乘各種交通工具，包括步行。

學生隊伍到達桂林後，分兩路，北上重慶，南去昆明。大學生將趕在西南聯大第二學年開學前，到達昆明。中學生則分別進入西南各省22個國立中學。

抗戰時期蔣介石委員長一再提醒國人《國破家亡，什麼都可耽誤，就是不能耽誤學生們的功課》。1937年11月，西南聯大遷往長沙，次年轉進昆明，師生三百多人，由長沙步行至雲南，張治中委派黃師岳中將率重兵□送，安全到達，可見政府對教育的重視。

父親抗戰期間，由衡陽調往桂林途中，有緣遇到了故宮文物、軍需物資、兵員人才，運用各種方式，動員全民西進，充實戰力，抗戰第一，勝利第一，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。這就是我們最終贏得對日抗戰勝利的抗戰精神。(12，本篇完)

第7篇：桂林大轟炸時的父親

民國28年(1939年)1月下旬，父親到達桂林。巧的是，我的母親隨外婆及一妹一弟，於一個星期前，先行到達。當時我的父親還不認識我的母親，兩個月後經友人介紹在桂林訂婚。

1939年抗戰進入中期，國民政府在桂林的行營，發揮了重大的指揮功能，負責指揮長江以南第三、四、九各戰區作戰。同年華中、南各省的民間工廠及軍需工廠，多達100多家，遷來桂林。桂林除了是政治、軍事的重鎮之外，也是全國學術文化精英匯集的地方。

1939這一年，日本軍機開始向我大後方實施《疲勞轟炸》，單就桂林一地，抗戰期間，日機出動多達1218架次，所投炸彈多係燃燒彈，大轟炸前後有六次，桂林城一片火海，人員傷亡近10萬人，炸毀之民房商店、軍事設施，難以估計。(1)

父親到達桂林的第二天，全連官兵各就崗位，各有線電架設排，分配中型卡車一輛。無線電排則配屬一輛，功能極差，初次投入戰場，被國軍虜獲的日本豐田軍用小卡車。

桂林全城軍用電話總機，就有十餘座，路線分佈山區多於平地，維護、搶修，難度更甚於813淞滬戰役。

第三天是個大晴天，上午上班上學時間，空襲警報響起，空襲黃色球升起，數分鐘後緊急警報接續而來，紅色球升起。

大約有兩個大隊50餘架日本軍機，自東北方飛臨桂林上空，一次永遠不會忘記的場景，出現眼前。(2)

大轟炸近一個小時後，解除警報響起，七星岩、穿山岩兩處天然防空洞內，近兩萬名平民，拼命奔回家園。目觀灑江西岸，北自虞山公園，南到南溪公園，最繁華的桂林城區一片火海，白煙、黑煙、火舌交替，直衝雲端。

當時我們的戰機，根本沒有能力升空攔截，高射砲兵所使用的最新式德製75厘米、88厘米高射機槍，也只能發揮一些阻嚇能力。

1938年11月，廣州失守，三十年代中國作家巴金，來到桂林，日本軍機多次空襲桂林的經歷，歷歷在目。寫下了系列日軍轟炸桂林罪惡暴行的散文集，《桂林的受難》、《桂林的微雨》、《生死者》。深刻描繪出轟炸後的桂林景象。

我看見那些被炸後的殘破房屋，成了一堆瓦礫。看見頭髮和衣服還站在地上帶血的人皮，看見了排列在郊外街巷裏等待處理，無辜者的屍體。無法在火堆中，找到任何可用的東西。旅館樓房坍塌了，如山洪爆發的巨響之後，我聽見一個男子在廢墟上發出救命的聲音。(3)

搶修電話線是通信兵急迫的任務，那怕是空襲中也要出任務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桂林行營，通往各戰區、各部隊的電話線路，必須24小時□通，出了狀況，就是槍林彈雨，也要赴湯蹈火，置生死於不顧。

父親在執行任務中，上有敵機轟炸，地面部隊頻繁移動，哀鴻遍野、觸目驚心。電線桿上可見血肉模糊的殘缺手臂，水溝中橫七八豎身首異處的屍體。路邊一位哀號的母親，緊緊抱住被炸死的一對兒女。

任務中，父親遇見一位美聯社的戰地記者，不顧自身安危，捕捉戰爭畫面，通信兵冒死搶修電話線，也入了鏡頭。正是父親帶著弟兄，前往英國駐華使館新聞處桂林分處，搶通電話的途中。父親心情激盪，看見一位外國新聞媒體工作者，不畏生死，克盡職守。想到自己的軍人身分，能在自己的國土裏，為保國□民，抵禦外侮，盡忠職守，也就心安理得了。這年四月，父親奉令調往重慶，接受新的任務。(4，本篇完)

第8篇：重慶大轟炸及

隧道慘案

1938年11月，抗戰進入第二期，日本對湘、桂、黔、川各省進行轟炸。12月26日，首次對陪都重慶實施戰略轟炸，沿著嘉陵江畔投彈三百餘枚，測試中國軍隊的作戰能力。陪都的軍事通信，受到嚴格考驗，層峯責令通信兵團，重新佈署兵力增至一個通信兵營。

1939年3月，父親奉令隨部隊，移防重慶。因湘桂鐵路桂林至柳州段，已被日軍炸毀，無法轉乘黔桂鐵路火車北上重慶，只有徒步行軍，過潯江入貴州，進四川。

與其同時，我的外婆帶著我的母親，卻從桂林順灑江接柳江南下柳州，轉輾貴陽到達重慶，與我的父親會合。(1)

1939年3月下旬，父親跟著這支通信兵部隊，從桂林出發，北上龍勝到達三江，全長120公里，尚有汽車支援。

餘程至貴陽600公里，通信器材改由馬馱，官兵步行。個人裝備：黃卡其布軍常服、長褲、布帽、S腰帶、倒U型背包、水壺、布綁腿、黑襪，膠鞋換成草鞋。

每天行軍12小時，每小時以8公里速度行進，隊伍縱深1公里，連長在前，副連長壓後，各持野戰無線電話，以掌握部隊狀況，每日固定與鄰近駐軍，以收發報機，報告部隊位置。

(2)

貴州省的地勢平均為海拔一千公尺，西部高於東部，部隊行經的東南山區，也在五百公尺以上。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之下，是廣西北上四川，避免日機轟炸，最快的一條通道。

入黔後，由從江縣，經榕江縣到都勻這一段，所經之處河流湍急而狹窄，又無航船之利，且山嶺起伏、平地極少、春雨綿綿，道路泥濘不堪。

日間行軍，夜間借住苗寨、侗寨，埋灶紮營。驚悚的是，半夜狼群覓食、攻擊營帳，必須獵殺才能阻嚇。

欣慰的是，苗侗各寨，居民善良，給予部隊諸多協助。沿途除了瀏覽雄偉山川，秀麗美景外，也見識了苗侗民族的奇風異俗，文化特色。

從江：苗族岜沙人，男性勇士帶刀帶槍，捍衛家鄉。岜沙男女，面向東方倒退行走，祭拜太陽。15歲成年，陰曆6月15日為情人節，舉辦鬥牛、拔河、盪鞦韆、搶婚嘉年華。

榕江：每年有侗族服裝表演，與雷山縣苗族雷同，以蘆笙錦雞舞慶祝。榕江侗女，平日均穿著超級短裙，展現青春活力。

三都：屬水族，有自己的象形文字，用水曆。

丹寨：每年有沖洗樓板習俗，婚禮慶典，以板凳舞娛樂佳賓。

父親的這支行軍部隊，到達貴陽時，已經是第八天中午了。餘程到重慶這一段，全連改搭汽車入川。比起我的外婆和母親，早到十天。(3)

1939年4月中旬，父親抵達重慶，部隊隨即入駐嘉陵江南岸沙坪壩，近公園處的一座營區內。外婆和母親一家人，則在下旬到達，被安置在一處民宅區，與父親的營區相去不遠。

重慶位於嘉陵江與長江的會合處，形似半島，酷似一隻行進中的臘腸犬。嘉陵江自西北往東南流，長江自西南往東北流。地勢高出江面百餘公尺，城市沿金碧山，山巔而建，街道馬路上上下下，高低相連，故有山城之稱。城東、北、南三面，進出城門均須徒步三百級的石梯，如今已有環城公路。江岸坡度陡峻，沿山多天然洞穴，抗戰時期成了民眾躲空襲時的防空洞。當時重慶的人口，已達200萬人。(4)

父親進駐重慶沙坪壩營區後的第二天，接受通信兵第一團團本部，為期兩天的業務講習，課程包括：判讀重慶市區地勢圖、瞭解地下電纜配置、部隊番號駐地、戰指中心關係位置等等。

轄區有20個區縣，面積達一萬七千餘平方公里，團級以上部隊均設無線電台及電話總機各一座，電話線架設至陣地崗哨。

抗戰時期的中華民國陸軍通信兵部隊，已進入短波無線電接力時代，抗戰初期已啓用載波機、微波電台、有線電同軸電纜。中華民國在武器裝備上與日本相對落後，但國民政府投入大量資金，採購歐美先進通信器材、培訓通信技術人才，不遺餘力。國軍通信作戰能力，絕不亞於日本。

抗戰中期，國軍已擴大編制，成立了三個通信兵團。保障了戰略警報訊號和情報資訊的迅速傳遞，更成為軍事行動戰術指揮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。(5)

在四川，當地人稱老鼠為《耗子》，四川的耗子繁殖快、體壯碩、性兇惡，一隻大耗子有五、六斤重，老鼠咬死貓，在四川不是新聞。

1939年5月的頭一天晚上，重慶市發生了一件異常的老鼠大遷徙景觀。上萬隻老鼠，成群結隊逃離市區，搬往鄉下。

事隔一日，重慶市遭逢了一次人類戰爭史上，史無前例的《五三、五四》空中大屠殺事件。

1939年5月3日、4日兩天，日本軍機向重慶市區，作了一次《地獄式的轟炸》。5月3日，首批日機就有63架，接續兩天輪番轟炸，投下炸彈176枚，燃燒彈116枚，重慶市在一片火海之中。炸死3991人，傷2287人，毀屋4871棟，創下戰爭史上，一次空中屠殺，死傷超過6000人的空前紀錄，事件發生後，世界輿論嘩然，紛紛指責日軍惡行。(6)

執行轟炸任務的日本軍機，隸屬海軍航空隊，第二天由63架，增至72架。對重慶23.91平方公里的渝中半島，政治文化商業中心，進行連番轟炸，平均每平方公里落彈12枚。

轟炸機分三個梯隊，由半島尖端的朝天門廣場為起點，由東至西轟炸。第一梯隊逆時針，順嘉陵江沿岸，向西轟炸。第二梯隊順時針，由長江沿岸，向西南方轟炸。第三梯隊經市中心，跨越兩江隧道、石黃隧道至鵝嶺公園。整個半島沒有一條街，沒有落彈。

父親趁著解除警報空隙，帶領弟兄搶修電話線路，目覩每根電線桿上，都有斷臂殘肢。除了搶通電話外，還要處理殘屍。大田灣體育場內，遺體堆積如山，驚恐悻怖，觸目驚心。

中國1940年代作家老舍，經歷了這次大轟炸，與重慶市民徹夜奔逃，劫難之後，發現了一種新的精神在復活，在他的文學作品中，有如此描述：沒有哭啼，沒有叫罵，火光之前，大火之中，避難的市民靜靜地奔向公園。偶然有聲高喊，是服務員的《快快走》。偶然有陣鈴聲，是救火車的疾馳。沒有搶劫，沒有怨罵，這是紀律，這是團結，這是勇敢，這是五千年文化的教養，是在血與火中，表現出來的，無所侮的力量與氣度。(7)

五三、五四大轟炸後的重慶，已是殘垣斷壁，滿目瘡痍，市內的景象形態徹底改變。電力、電信系統嚴重受損，入夜後全城一片漆黑，長達半個月之久，電話線路近九成中斷。

百姓家自動將煤油燈放在家門口，方便行人及勤務人員通行，當時稱呼這種燈為《太平燈》。

外界信息靠口口相傳，中央日報、大公報、新華日報發行量加倍。中央廣播電台、軍中之聲，隨時插播新聞，直流收音機被搶購一空。

機關、銀行、公司、商店，也改變了上下班和營運時間，從上午七時至十時，下午四時至十時。

儘管生存艱難，但日軍的轟炸，沒有打垮重慶軍民的鬥志。營房炸毀了，克難營房隨即建起。商店被炸了，只要沒有被燒毀，第二天，《照常營業》的牌子，就掛了起來。

被炸掉，被燒毀的百貨商店、餐廳、茶館，只要一丁點可用之地，簡易竹製店面，兩三天後，就可原地建成，繼續營業。生產事業或地下化，或遷移郊區。炸不垮的重慶，屹立不搖的重慶，世界媒體競相報導，這就是我們的《抗戰精神》。(8)

帶着三個孩子，甫由桂林經柳州，北上貴陽，到達重慶的外婆，總算有了一個暫時棲身之地，不到一個禮拜，卻碰上了《五三、五四大轟炸》。

一家人有了上次在桂林躲警報的經驗，這一次就顯得相當從容，前置作業準備充足。從空襲警報、警急警報到解除警報，均遵照重慶市政府頒發的《遵行事項》行事。

解除警報一響，全家人跑出防空洞，直奔家門。家已在熊熊燃燒，想要搶救一些最基本的用品衣物，已不可能，最可惜的是，兩本頗有時日的照相簿，已成灰燼。

家沒有了，孩子哭了，外婆呆若木雞。當年只有七歲大的舅舅，急著問外婆：娘，錢包帶了沒有。

外婆恍过神來，看了看

緊握在手上的小在袋，察看一下，回答：帶了。

全家人的所有財產，也只有那個小布袋裡的一些乾糧和有限的現金而已。這一次的大轟炸，無家可歸的市民有兩萬人之多，疏散的民眾，多達25萬。

外婆領著孩子進了收容所，也聯絡上正在勤務中的父親。父親與外婆，連夜找到了外公的故舊，服務於後勤單位的鮑鐸上校。以失蹤官兵眷屬的名義，申請暫住南岸《官兵休假中心》的一間小房間內。(9)

外婆一家人窩居南岸官兵休假中心期間，父親奉令移防南岸立石溝何家莊園。莊園面積約一英畝，一分為二：朝南，背山坡，闢為營區。朝北，向長江，為連幢民宅。

當時的通信兵第一團團長孫伯超，是母親的大伯父尹世錕保定軍校的同學。得知外婆處境後，當即派副官主任與莊園何老闆情商，順利住進何家大院。

這年10月9日，父母親在孫伯超團長證婚下，於重慶國際飯店結為夫妻。次年7月7日，我誕生於立石溝陸軍野戰醫院。

民國30年(1941年)6月5日，日機對重慶疲勞轟炸，持續五個小時，釀成死亡逾三千人的《大隧道窒息慘案》。(10)

民國27年(1938年)2月18日至民國32年(1943年)8月23日，日本陸、海軍航空部隊，遵從日本天皇及最高本部指令，對重慶地區展開轟炸作戰，為期5年6個月，史稱《重慶大轟炸》。

國民政府為應因日本軍機持續轟炸，減少生命財產損失，就重慶周邊地勢地形地質優勢，挖掘多處防空洞穴。其中位於渝中半島偏西近較場口，連接數條馬路，路口皆有出入口，可以容納近萬人，名為《十八梯隧道》的一座防空洞，規模最大。

民國30年(1941年)6月5日，晚間6時許，日軍出動24架戰鬥轟炸機，對重慶進行航空進攻作戰。此次行動，在戰術上作了修正：1，空襲時間拉長。2，輪番盤旋，並低空掃射，每梯次最多6至9架。3，轟炸防空洞周邊設施。(11)

重慶市政府對日本軍機空襲時之施放警報、人員疏散均有詳盡規定。敵機一起飛，我方情報人員立即通報機型、架數及飛行方向，越過宜昌施放空襲警報，到達萬縣施放緊急警報。從空襲警報到緊急警報，通常需要20分鐘，市民有充分時間，可以到達防空洞內。

6月5日的天氣晴朗高溫，午後有陣雨，近六時雨停，正是晚間用餐及餐後逛街乘涼時間，全市各區一反常態，空襲警報長鳴，隨即施放緊急警報，尤以商業中心民族路、民權路、鄒容路一帶，市民驚慌失措，狂奔附近防空隧道避難。一時之間《十八梯防空隧道》擁進上萬民眾。(12)

敵機約晚間七時飛臨重慶上空，在渝中半島開區，重點投彈，不時低空盤旋掃射。半島上空始終保持6至9架，一波離去，一波再來，長達7個小時，至次日凌晨，以拉長空襲時間，達成其戰術上之要求。

這座十八梯公共防空隧道，因施工缺失，遲未驗收。由於襲擊突然，權宜緊急使用。一時上萬人湧入，立感空氣稀薄，嚴重缺氧。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，首先兒童嬰兒不停啼哭，牆壁上的油燈，光線逐漸微弱，以致熄滅。氣氛頓時緊張，有人開始煩躁不安，舉止反常。

生還者敘述當時情形：頭腦發悶，大汗淋漓，身體漸漸疲軟，呼吸困難，似乎淹在熱水之中，左右的人不由自主的把自己的衣褲撕碎，好像精神失常，甚至互咬對方。傷心慘目不可卒睹，很多人掙扎到生命最後，含恨離開人間。

凌晨一時許，警報解除，身體尚能支持者，群體衝出洞口，又發生推擠踐踏事件，死傷不計其數。隧道內臉部扭曲者、手指抓地者、五官淌血者、皮膚破裂遍體鱗傷者，處處皆是。(13)

事件後，國民黨中央黨部、國民參政會、重慶市參議會聯合組成《大隧道窒息慘案審查委員會》，對慘案進行調查。

重慶市民對審查委員會的各次報告，頗為不滿。掩蓋死亡人數、管制消息報導、空襲警報接續緊急警報，瞬間施放交代不清、草率處理屍體、未能及時搶救尚有生命跡象者等等，備受指責。

《漢奸說》、《日本間諜說》、《防空洞工程舞弊說》，紛傳坊間。有人在各隧道放置照明燈，指引敵機轟炸，也成了話題。

綜合當時的《新民報》報導，窒息慘案除了死亡人數最多的十八梯隧道，逾三千人外，尚有石炭市大防空洞逾兩千人，演武廳洞子也有近兩千人，因此窒息萬人之說甚囂塵上。

為了平息民怨，國民政府將重慶市長吳國楨，衛戍總司令兼防空司令劉峙，隧道工程處處長吳國柄撤職查辦。

慘案發生後引起美國國會關注，1941年8月26日，羅斯福總統派馬格魯德將軍，為首任《駐華美軍軍事顧問團》團長。三個月後的1941年12月8日，日軍偷襲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爆發。次日，中華民國加入同盟國，對日宣戰。1942年1月，蔣介石在重慶就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，史迪威為參謀長。至此，抗戰進入第三階段，中華民國不再孤軍奮戰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。(14，本篇完)

第9篇：抗戰勝利前

父親的軍中資歷

民國25年(1936年)8月，黃埔軍校十三期，在南京招生。父親甫自陸軍通信兵團教導大隊，修業兩年畢業。以准尉通信員身分，分發揚州實習，而錯過投考機會。嗣後，黃埔各期在成都、昆明、貴陽各地招生，均因職務需要，耽擱報考。

民國29年(1940年)5月，黃埔17期在成都招生，父親以中尉排長身分，直接甄選入學。次年6月，尚在修業期間，接奉命令晉升上尉，11月20日畢業於四川銅梁。隨即出任通信兵第六團教導大隊四中隊中隊長，培訓部隊中，嚴重缺員的通信兵士官，駐地在四川榮昌七寶岩。

抗戰時期的國軍任官派職，均由其任職單位，發佈委令出任。民國29年(1940年)10月1日，父親已是中尉排長，接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，由委員長蔣中正簽署的任官令，核定父親敘任為陸軍通信兵少尉，除□案函送行政院轉請任命外，先令仰遵。造成任命與實際官階不符現象。

民國32年(1943年)5月，通六團教導大隊通信士官培訓班第二期結業，父親接奉由軍政部何應欽部長簽署的任職令，至此，國軍任官有了專責單位。

民國34年(1945年)3月，父親前往昆明，準備出任中國遠征軍新職，暫編20師中校參謀。任官令由滇黔綏靖公署主任龍雲簽署，此項任命因家庭因素並未到任。父親1950年到台灣後，在國防部核官減俸作業中，未被承認。

民國44年(1955年)1月1日起，中華民國三軍軍官之任命，均由總統任命。(本篇完)

第10篇：抗戰勝利前之

中外情勢

嚴格來說中國對日抗戰，應該從民國20年(1931年)9月18日，瀋陽北大營事件開始，至民國34年(1945年)9月9日，在南京，日本向中國呈遞降書為止，整整打了14年。對中日兩國而言，日本以慘敗收場，而中國卻以《慘勝》結局。

最可悲的是，國共兄弟鬩牆，延續內戰到1949年，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，12月10日中華民國政府由成都遷往台北，兩岸對峙至今，國家仍未統一。回顧抗戰這一頁血淚歷史，以及勝利前的國際情勢和中國處境，留給國人的什麼樣的啟示，真得要深刻反思。

1，1945年2月4日至11日，美國總統羅斯福、英國首相邱吉爾、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史達林，在黑海克里米亞雅爾達密約，蘇聯爭取戰後在華利益，獲美、英同意，事後通知中國。

2, 1945年4月12日, 羅斯福總統逝世, 由副總統杜魯門繼職。4月29日, 義大利向同盟國投降。5月7日, 德國投降。

3,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, 毛澤東主席在延安主持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, 明確地說: 只有佔據了東北, 即使其他所有的根據地都丟了, 中國革命也有了好的前途。

4, 1945年7月26日至8月2日, 中美英三國在柏林舉行波茨坦會議, 三國會商促令日本投降事宜。杜魯門、邱吉爾出席, 蔣介石僅在宣言上簽字同意。

5, 1945年8月6日, 原子彈轟炸日本廣島, 8月9日轟炸長崎。同日蘇聯對日宣戰, 紅軍直取東北瀋陽(今內蒙滿洲里)

6, 1945年8月14日, 中蘇友好條約在莫斯科簽訂, 蘇聯給予國民政府復元後, 物資與道義上的援助, 進入東北之蘇聯紅軍可停留三個月, 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的問題, 由公民投票決定。

7, 1945年8月15日, 日本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。之前8月9日零時10分, 蘇聯在東北境內已有紅軍百萬。中共第八路軍及增編部隊60萬人, 兵臨東北候令接受東北。次日, 朱德總司令, 先後下達第一號及第二號, 向東北進軍命令。遠在華北地區作戰的國軍劉玉章52軍及劉安祺71軍, 未能及時趕到。

1945年8月下旬, 國軍才陸續抵達東北, 父親奉令派至陸軍通信兵第九團, 出任團本部少校參謀, 次年三月, 攜眷抵達瀋陽履新。隨即國共內戰, 在東北開打。(本篇完)

第11篇：抗戰勝利普天同慶

早在1945年7月, 抗日戰爭已近尾聲, 中國境內各戰區, 僅有小戰役及接觸戰而已, 中國部隊節節勝利。國軍四個方面軍及十一個戰區, 報紛紛傳至重慶。

8月10日, 也就是盟軍原子彈轟炸日本長崎、蘇聯對日宣戰的第二天, 下午六時, 一個大型樂團在重慶街頭, 首先演奏出雄壯的勝利交響曲, 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英雄及抗戰歌曲。揭開了抗戰陪都重慶各界, 慶祝抗戰勝利的序幕。(1)

與其同時, 中央日報、大公報、新華日報, 搶先全國其他都市發行號外, 報導日本即將投降相關消息。數十萬份號外, 瞬間搶購一空。人們情緒沸騰到極點, 長期悶在心中的怨氣、怒火, 完全盡情地發洩出來, 有太多的人, 激動地在哭泣。有東北老鄉流著淚唱着《松花江上》, 隨後高喊: 我們可以回家過年了。

爆竹聲、叫喊聲、汽笛聲, 響徹雲霄。一群大中學校的學生帶領著大家, 高唱抗戰歌曲《凱旋歌》、《旗正飄飄》、《義勇軍進行曲》、《長城謠》。抗戰涕淚愁何在, 萬里江山夢亦疑, 猶喜童心聞報, 此夜重慶無人眠。

次日清晨, 重慶全城大小商店, 均以《慶祝抗戰勝利》、《日軍投降》等大幅標語貼於門前, 紛紛燃放爆竹, 一時間爆竹賣得缺貨。人們便利用鏝鑼、面盆等物, 在馬路上不停敲打, 邊敲打邊高呼《我們勝利了》、《我們勝利了》。

8月11日起, 重慶市各機關、學校、部隊、營區, 紛紛搭建牌樓, 門口國旗飄揚。中央廣播電台、軍中之聲全天播音。各報館門前擠爆市民, 都在等待日本宣佈投降的那一刻到來。(2)

1945年8月15日正午, 日本天皇裕仁向日本全國頒發停戰詔書, 接受波茨坦公告, 實行無條件投降確定。數小時後, 重慶中央廣播電台及軍中之聲, 前後相隔10分鐘, 播出了數日來全國同胞, 期待已久振奮人心的好消息。每一顆心都在跳躍, 每一個細胞都在沸騰。連結一千二百餘串的爆竹, 在渝中半島商業中心, 燃放起來, 從東邊的小樑子一直燃燒到西邊的上清寺, 長達半小時之久。街上人山人海, 熱情奔放, 相互擁抱, 盛況不減8月10日當天。

接續國民政府蔣介石主席在中央廣播電台播音室，親自宣告《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》，播音過程中，民眾一致鼓掌歡呼《中華民國萬歲》。

住在重慶鄉下的人士，成群結隊渡江跑到重慶，渡輪全天加班運輸，足足有兩萬人之多。駐渝美軍也全部出動，十數輛中小型吉普車，插滿中美國旗，緩緩巡行街市，紛紛跳下車來，用英語高呼《聯合國勝利萬歲》，喝著洋酒，翹起大拇指，用生硬的華語不停說著《中國抗戰勝利》、《頂好》。一群擦皮鞋的孩子們，丟掉背著的小箱子，跨上吉普車，與美國兵齊飲香檳，還會說兩句《OK》《OK》。

熱情洋溢的美國兵擁抱著天真的孩子們狂吻，高高舉起年輕貌美的女學生，歡樂的情緒，像似瘋狂。我的二姨，剛剛從軍中之聲播報新聞後下班，也被美軍高高舉起，嚇得花容失色。(3)

慶祝抗戰勝利的活動，每天都在全國各地持續進行，延續到9月9日南京受降。

8月17日，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聲明，日軍業已遵照麥克阿瑟統帥命令，完成停戰狀態，一俟停戰協定成立，立即依約實行。

8月19日，同盟國對日簽訂停戰協定，中華民國代表團軍事委員會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，率團赴馬尼拉。

停戰協定簽署後，在華日軍向中華民國接洽投降的工作，正式開始。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，於前一日電令岡村寧次，派遣代表團到湖南芷江接受投降命令。

8月21日，大地氣清萬里無雲，芷江軍民晨□中興起，在國歌聲中，升起國旗，天空中飛機翱翔，交相輝映。

日軍投降代表今井武夫少將，下午三時四十分，率團至陸軍總部，晉謁參謀長蕭毅肅將軍，接洽投降事宜，並接受總司令何應欽上將致岡村寧次備忘錄。

蕭參謀長依據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委員長，8月18日致岡村寧次電令，要求今井武夫交出日本駐台灣及越南北緯18度以北地區內，所有日本陸海空軍戰鬥兵力部署及指揮系統表冊。

何應欽上將致岡村寧次備忘錄，主要包括三點：1，日本陸海空軍及輔助部隊，應立即停止一切敵對行動，所有武器、彈藥、航空器材、車輛及一切交通通信工具、文獻檔案等，妥善保管不得移動，絕對保持原狀，聽候何總司令派員接收。2，中華民國陸軍總司令部，要先在南京設置一前進指揮所，日方應從速照辦，並妥為保護。3，交付受降日軍，我方軍事長官及其所轄各戰區指揮系統表，就地接受投降。

為使接洽便利起見，日軍應提供電台呼號波長及通報時間表一份，回南京後，立即轉岡村寧次遵行。(4)

8月27日，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斡旋下，美國政府派出專機至延安，毛澤東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，到達重慶與蔣中正主席會面。毛澤東在重慶46天，杜魯門希望毛蔣的會面，能夠促成國共兩黨組成聯合政府，領導一個統一的中國，確保來之不易的抗戰成果，不會淪為內戰。

10月10日晚，毛蔣兩人與中外顯要，在重慶大梁子戲院欣賞平劇《群英會》，演畢毛起立振臂高呼《中華民國萬歲》，《蔣主席萬歲》。

毛澤東於10月11日飛回延安，向親信談到重慶談判時稱《那只是紙上的東西》。

第二年，國共內戰全面開打，1949年10月1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北京成立，中華民國政府播遷台灣。

9月2日上午九時，二次大戰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，降書簽字儀式，在日本東京灣停泊的美國戰艦《密蘇里》號上舉行。中國代表軍令部長徐永昌上將，繼聯合國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元帥、美國代表尼米茲元帥之後，第三位在受降書上簽字。

9月9日上午九時，在日本向聯合國投降後一星期，中國戰區日軍投降簽字典禮，在南京

中央軍校大禮堂舉行。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出席的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一級上將，接受日軍投降代表駐華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大將，呈遞的降書。中央政府並定九月九日為《勝利日》。

民國26年南京淪陷後不久，劫後餘生者曾在郊外廢墟中掘得一碑，上有劉伯溫題詩一首，字跡隱約可見，詩云：陣陣胡笳吹斷腸，人民到處泣流亡。苦辛耐得三千日，燕翼孫謀萬世昌。

從《七七事變》起，到《九九南京受降》止，恰合三千日之數。(5)

抗戰勝利前的1943年6月，陸軍通信兵第6團通信士官培訓班，整編為軍士訓練大隊，父親升任為第一隊少校隊長。

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10月，奉調陸軍通信兵第9團任少校參謀，駐地在瀋陽。生效日為1946年4月1日，到職前暫留軍士訓練大隊，協辦招生事宜。

當時，國軍裁軍甚囂塵上，為何續辦招生，用意至為明顯。

1946年2月，父親攜眷離開四川，經武漢、南京、上海，赴東北上任。本擬撥冗由武漢轉往故里河南南陽探望，因東北情勢緊張，未能成行。

父親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離開南陽，這年他14歲，自此再也沒有踏上這塊土地。2007年10月，父親以90歲高齡，終老於台北。不竟想起父親生前曾經提起的一首詩，艾青的《我愛這土地》：假如我是一隻鳥，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。歌唱這被暴風雨打擊着的土地，這永遠洶湧着我們的悲憤的河流，這無止息地吹着的激怒的風，和那林間無比溫柔的黎明。然後我死了，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□面。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着淚水，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。為什麼我的眼□常含着淚水，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。(6，本篇完)